

骏马奖作家观察(十三)

时间变戏法:循环、并置与绵延

——满全诗歌创作论

□阿尔查(蒙古族)

满全的诗歌植根于草原这片辽阔苍茫的旷野,既借民族集体记忆的意象展开书写,也着力彰显坚韧不屈的生命美学。他试图以诗歌为基石,建构属于自己的精神王国,这一王国由个体隐秘的心灵史、民族历史的记忆史,以及饱含未来幻想的精神史共同构筑

作为活跃的蒙古族诗人,满全的诗歌创作独树一帜,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截至目前,他已出版《温馨时光》《飞鸟集:一段天边的浪漫故事》《遥远的雨季》《春夜,谁在呼唤》《今夜,大海在北边》《水之音》六部诗集。无论是诗集标题的意象指向,还是文本内容的精神内核,均折射出诗人的目光从未停驻于“此处”,而是始终朝向“彼处”的远方。

满全的诗歌深深植根于科尔沁草原的文化沃土,以细腻笔触描摹草原风情,镌刻民族历史记忆。诗人将个体丰富的情感体验嵌入独特的哲学框架,书写历史题材时更打破线性时间的桎梏,把过去、现在、未来并置压缩,并让其意义在时间的绵延中拓展至宇宙的维度。时间的循环、并置与绵延,共同构筑起诗人独有的写作风格。

循环的时间:抵达生命内核的方式

在满全的诗歌中,诗人敢于直面人生的孤独。对诗人而言,它虽常自带与世隔绝的疏离感,却能催生诗人独有的敏锐触觉,使其精准捕捉生活的剧烈变迁。这份孤独首先具象化地体现在数字“一”的运用上,一个人、一匹马、一只老鹰、一座古都、一滴泪珠、一朵蔷薇,这些意象皆指向个体的独立承担。诗人曾坦言:“一个人在黑暗的角落里孤独地徘徊时/曾经誓言/不再写诗”。但很显然,诗人不会放弃写作。在诗人笔下,“中心广场不在于中心地带/喧嚣与杂乱往往遮蔽一个人/或者掩盖一座都市的孤独”的表述,精准映射了现代人的复杂生存经验。但即便如此,诗人仍未停止追寻:“凝视无尽的午夜/一个人默默地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孤独/彼岸在何方/疲惫的鸟群决心渡过苍茫大海/只是为了心中的岛屿”。这份对本真“此在”的执着探寻,正是以强大生命力作为支撑的精神坚守。诗人的自省意识使其直面精神的困境——过往历史的消逝、现实生活的虚妄与未来图景的迷雾。面对生活中的浮躁、焦虑与孤独,这份执着的探寻,既是对“沉沦”状态的反抗,更彰显着诗人永不妥协的精神与不可撼动的信念。

诗人在“有”与“无”的差异性空间里探寻,在时间的循环中追寻真理。正如《东京地铁》中所写:“电车每次进站/很多人下去,要结束行程/很多人上来,要开始行程/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就这样,生活在反复和轮回中延续着,如同/反复阅读的单词,抑或复制品”;又如《无极》中的慨叹:“穿越皆空 依然皆空/攀越无

极 依然无极/生命是一首绝望之歌/一切开始又结束”。

满全的诗歌书写并未遵循线性时间观,而是在“有变无、无变有的无限循环”这一观念下,持续思考存在的核心意义。满全将个体生命感受置于无限循环的语境中,在重复中求索意义。例如在《飞鸟集:一段天边的浪漫故事》中,世界秩序始终在“建构—破坏—重建”的逻辑中演进。这种对时间循环的认知,既与博尔赫斯对时间循环的阐释一脉相承,更植根于蒙古族文化中的轮回观念与自然崇拜。

并置的时间:打开历史纵深的装置

满全的诗歌,字里行间充盈着雄健豪迈的气魄。诗人追慕永恒的勇士,遥想远古时代的英雄。他曾说过:“草原是精神版图和审美地标。”在诗人笔下的历史文化意象背后,总能窥见一个若隐若现的“我”,使得诗作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交融,被并置在同一时空维度之中。如诗歌《大都往事》:“漫山遍野的黄花,是大地的音符/……/站在帝国废墟上,眺望远去的背影时,勒勒车游荡在天边/很多时候,猎犬依然是我的思维方式”;又如《大漠孤烟》:“勇士的弯刀,对我是一种方向/今夜,是谁在城堡里畅饮凉州烈酒,王朝背影/犹如遥远的残月”。这些诗句将过往的历史图景、当下“我”的在场感知与遥远的天边意象熔铸一炉,在实现时空并置的同时,打开了历史纵深。“雄鹰是翱翔的姿势,对我是一种向往/骏马是飞腾的方式,对我是一种安慰/手中的钢剑长夜无眠,对我是一种态度”。对诗人而言,那些反复出现的钢剑、骏马、雄鹰等核心意象,以及贯穿其诗作的“寻找”主题,诸如《温馨时光》中对遥远豆田的追寻、《飞鸟集:一段天边的浪漫故事》中对新秩序的探求,在更大程度上,皆是诗人对精神坐标的执着寻觅。

当世界陷入混沌,诗人的职责便在于从中锚定秩序的脉络。满全在创作中始终期盼完成这种秩序的梳理,在《飞鸟集:一段天边的浪漫故事》里,秩序由玉玺、宝剑与寓意生命的长生水共同维系。在诗人看来,历史既是一种想象性的叙述,更是时间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进而言之,满全的诗歌在表层叙事中还还原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追寻永恒不朽的英雄,在深层结构中则暗含现实批判,其内核是对勇士般的刚毅精神的追寻。《古城》中写道:“暖风徐徐,春雨蒙蒙/战火远去,王叔早已崩溃/古城,依旧守候着王朝的废墟/古城,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坚守”。在满全的诗学体



系中,风景是勾连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它比人类更具历史的经验,蕴含着创造性的色彩与多重阐释的意义。这些风景不再是被动的审美客体,而是亲身参与历史潮流的能动主体——既是历史真实的记录者,也是历史记忆的恢复者,更是时空的见证者。

满全在诗歌中回望过去,赋予历史诗意的苍凉与温度。历史并非遥远的过往叙事,而是呼应现代社会的鲜活经验:面对当下社会的图景,他寄希望于经过历史积淀的勇猛精神以突围困境。由此,被赋予历史维度的风景承载着厚重的生命体验,既印证着诗人的主体认知,也确证了其精神主体性的存在。

绵延的时间:驶向“远方”与希望的航道

在满全的诗歌想象中,孤独并非永恒存在,它会在时间的绵延中逐渐消解;伫立的历史遗迹、父亲的豆田、英雄的赞歌,亦会在遥远的天边重新浮现。诗人认为,在宇宙的边缘、世界的尽头,存在着另一个“我”的想象,这个想象没有起点,亦无终点。在他看来,无法具身抵达的“此处”,可以通过“远处”来抵达;无法抵达的“黄

昏”,亦能借助内心构建的天边来抵达,这便是诗人穿越时间的辩证法。

满全在诸多诗作中都书写了于天边寻得精神慰藉的生命体验,如“清风从海面吹来/我依旧相信渺远的天边必有知者”的笃定期许,“寻找武士的钢剑和失落的城堡/从此一个人不再孤单”的豁然顿悟。《温馨时光》中“远方的乡邻”“远方的豌豆田”都赋予遥远乡邻以深刻的象征意义,因此当诗人“重新穿越古老的旷野和漆黑的午夜”时,便不会再感到孤单。

“遥远的天边”既是承载乡土温情的父亲豆田,也是永恒英雄的重生之地,它呼应着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象征理想家园的“宝木巴”。在满全的诗歌中,黄昏是通往“天边”的隐秘路径。作为昼夜交替的临界节点,连接遥远天堂与大地的纽带,黄昏不仅是诗人疏解孤独的出口,也暗含着对希望的隐秘期许。《大都往事》中“相信黄昏岸边有人/等待黎明的降临,那个人或许是我的后世/这时,我身体里流淌的不仅是浩然之气/还有西域河川和女人的哀求”的沉吟,《星期日,或者无主题日子》中“花开花落,是季节的轮回/仰望星空,是孤单的表述/一场夏雨,何时再来/独自坐在黄昏深处/依然想起宝剑、勇士以及骏马奔腾的年代”的感怀,皆以黄昏为媒介,搭建起通往

天边的精神桥梁。

换句话说,诗人所建构的“诗化宇宙”(海日寒语),其生成模式可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分解与组合。诗人惯于将整体的存在拆解为独立的结构单元,或对碎片化的结构进行重新整合,诗歌中的世界由此兼具同一性与异质性特征。譬如《飞鸟集:一段天边的浪漫故事》中英雄形象的反复浮现、《今夜,大海在北边》中时空碎片的交错拼接,最终都凝聚为一个融汇真善美的整体性诗化宇宙。二是延长与缩短。“遥远的天边”是诗人以想象构建的精神乌托邦,在这一空间里,时间的长度被自由拉伸或压缩,逝去的光阴与消逝的空间在此重新聚合,个体的孤独情愫得以消解。

总的来说,满全的诗歌植根于草原这片辽阔苍茫的旷野,既借民族集体记忆的意象展开书写,也着力彰显坚韧不屈的生命美学。他试图以诗歌为基石,建构属于自己的精神王国,这一王国由个体隐秘的心灵史、民族历史的记忆史,以及饱含未来幻想的精神史共同构筑。在他的诗学认知里,孤独是生命的搁置状态,历史是生命的重叠形态,而遥远的天边则是生命的超越境况。

(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生)

不同教育观念下的命运嬗变

□羌人六(羌族)

对羌族作家阙玉兰长篇小说《滋长》的阅读,既出于读者对故事的兴趣使然,也出于我对本民族作家文本的敬意与好奇。我认同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文学观念,他将小说视为一种“诗意的历险”,通过由经验、想象和观察得来的故事,读者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奇遇,那些隐秘的角落、人生和命运,在阅读进程中扑面而来,使我们百感交集,这是文学的奥秘和价值所在。《滋长》的故事并不复杂,读罢,土森和李二婶两家人迥异的教育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命运际遇,还有那些寓意深长的民间故事,在我脑海里萦绕,久久不能释怀。或许和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有关,我对《滋长》中的人物和故事倍感熟悉和亲切,也有许多共鸣。作家仿佛坐在火塘边,用家常的素朴语言为我们奉献出这样一部独具匠心的作品。

当下,无论乡村还是城市,普通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可谓“异曲同工”,无一例外地倾注大量心血。《滋长》旨在通过细腻的书写,将两个有着不同教育观念的家庭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探讨不同观念缔造的命运嬗变。龙塘村的土森家和邻居李家都是贫困家庭,但两家人教育子女的方式截然相反。土森的婆婆和父母重视“院子里栽松柏——清白到家”的家风传承,以及儿女成长过程的思想品德教育,绞尽脑汁也要让孩子读书,可谓“高瞻远瞩”;李家则忽略教育,目光短浅地将重心停留在家庭生活琐碎的日常中,不容许儿女读书、接受教育,只想把儿女随意养大。两个家庭的命运由此衍生出巨大的差别,这便是《滋长》的主要故事轮廓和叙事脉络。

《滋长》是一部扎根岷山腹地、聚焦羌族儿女成长图景的小说,故事书写的是羌寨两个普通家庭儿女的成长轨迹,探讨的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话题。小说题为“滋长”,较为鲜明地概括了作者的写作意图,随着阅读的深入,不难发现作者乐此不疲地持续耕耘着这样一个命题:具体的生长环境、教育环境对个体持续、深入、透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如影随形的。作者似乎在透过碎片化的系列故事,不断提醒我们,人的生存离不开必备的物质条件,但更需要精神食粮的滋养,物质条件的贫瘠会让人承受苦难,但精神生活的缺失会让人变成行尸走肉。当然,一个人拥有怎样的精神世界,与其成长的环境密不可分。正如作者在序言中交代的:“人就像一颗种子,撒在肥处,肥生;撒在瘦处,瘦长。”言简意赅地概括了社会环境、家庭条

件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除现实层面的书写之外,《滋长》也独具匠心地杂糅了梦幻的民间故事、传说和箴言,与文本中的故事彼此呼应,作品因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民间气质,可被视作一部颇具寓言色彩的成长小说。故事主线皆依托土森的成长轨迹和李家的互动展开,辅以信手拈来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虚实结合的书写方式使得文本突破线性的叙事模式,变得更为厚重。

《滋长》书写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首先就是土森婆婆。老人家虽然出身寒微,却格外重视儿女后代的教育和家风建设,几乎是整个故事的灵魂。立德树人的价值观念和和生活智慧蛰伏在她的言谈举止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晚辈们的思想品行。这也是一个菩萨心肠的善良老人,出门一趟,有水果糖也要带回家均分给家里的每个人。值得同情的是李二婶这个角色,因为种种家庭变故,因为不重视家教,因为思想的局限,她自食其果,在漫长岁月中变成了一个自私的可怜怨妇。书中还有令人难忘的父亲形象。土森的父亲为营救同伴老韩叔而又义无反顾地跳入洪水之中,他的行为有一种深切的道德引领作用,作者在故事中也作了交代:“羌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同路不落伴。”李家勇挑重担却意外丧命的大姐、忍辱负重却并不心甘情愿的二哥、偷鸡摸狗最终遭到惩罚的三哥、善良淳朴却只有“小聪明”的四姐……他们坎坷曲折的命运,共同“滋长”了这部小说。

优秀的文学作品通常拥有两大基石:一是审美基石,包括作品的语言质地和想象力度;二是蕴含其中的道德基石,即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如作者所言,她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来让人们了解羌寨百姓的生活状况和民风民俗,增强对孩子的教育意识,更新人们的生态理念。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毫无疑问实现了作家的写作目的,真实鲜活地再现了羌寨的生活图景,是一部较有启示意义、内容丰厚的民族文学作品。当然,就作品的艺术性而言,《滋长》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比如,在叙述语言上可更注重锤炼与技巧,细节描写也可更加细腻。此外,两家人不同的命运际遇,是不同教育观念导致的结果,但无论福报还是恶果,都值得尊重、深思乃至深切地同情。如果能从这样的视角进入文本,我们将会挣脱世俗成见的束缚,发现更多关于人生的启示。

(作者系作家)

充满灵性的生态诗学空间

——评长篇儿童小说《翠羽》

□徐虹

彝族女作家李夏的长篇生态儿童小说《翠羽》,不只是一个儿童冒险故事,更以儿童文学的轻盈姿态,承载着生态美育、生命哲学、文化传承的厚重命题。作者以其独特的生命体悟、生态视野和细腻叙事,成功构建了一个充满灵性、平等互爱的生态诗学空间,展现出多元视角与文化交融下的生态共同体意识,在看似微小的切口处,体现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多民族生态文化交融和民族团结的宏大主题。

小说故事的发生背景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恐龙河自然保护区附近,这里是目前中国已知绿孔雀种群数量最多的地方。小说以彝族少年松宰、傣族少女龙伽和彝族少女乌左母三位“小冒险家”的视角切入。因一则森林“精灵”的传说,三位少年对广袤神秘的哀牢山大森林充满好奇。他们主动结识神秘护林人十三爷,并在鸟类摄影师鸟叔的引导下学习绿孔雀的相关知识。从误拾鸟蛋到见证绿孔雀翠羽破壳,三位少年与偷猎者斗智斗勇,最终将翠羽放归大森林,完成了一次心灵的洗礼。翠羽的诞生与回归自然之旅,成为连接三人的情感纽带,更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下生态意识强化的精妙隐喻。

不同民族少年的相遇不是文化差异的碰撞,而是生态智慧的互补与融合。松宰对山林的熟悉、乌左母对自然的敏感、龙伽与水系的亲近,这些特质在保护绿孔雀的共同使命中转化为独特的力量。这种不同文化视角下的生态智慧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结晶,构成了《翠羽》生态美育的独特维度。当不同民族的生态知识在绿孔雀这一濒危物种面前交汇时,读者看到的是人类作为整体与自然对话的可能性。

松宰和好友乌左母、龙伽在十三爷、鸟叔和奶奶潜移默化引导下,理解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逐渐形成生态保护意识,对万物充满怜悯和热爱。因此,当孩子们发现翠羽身处危机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因为他们懂得了,爱不仅是温暖的感觉和美的愉悦,更是艰难时刻的勇气与担当。于是,当孩子们发现偷猎者捕捉到翠羽时,他们的悲悯与同情迅速转化为具体行动,解救和放飞了翠羽。这一行动也标志着孩子们从自然的玩伴成长为自然的守护者,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成长蜕变。

傣族人叫绿孔雀“龙鸟”,彝族人说它是“山里的精灵”。虽然称呼不同,但都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和美好期盼。在彝族史诗中记载着“万物有灵,人乃其一”的朴素真理,强调天、地、人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宇宙观。松宰通过奶奶简朴而充满智慧的引导,幼小的心灵中充满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任意毁坏森林、捕杀生灵的大人的愤怒。各民族关于生态保护的谚语、长辈们的口耳相传和言传身教,让孩子们耳濡目染,对自然万物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和向往。生态保护成为各民族发展和多元文化繁荣的内在需求和文化特性,具有蓬勃鲜明的生命力。

《翠羽》的深层价值在于构建了一个“万物同生”的意义之网。小说中的绿孔雀不仅是保护对象,更是连接自然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群的生态符号。彝族和傣族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及现代生态保护的科学精神,在这张意义之网中交织融合。少年读者通过阅读,不仅了解到保护珍稀物种的重要性,更在心灵深处种下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的种子,这种世界观将伴随他们成长,最终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作品中的不同民族角色各有其文化特质与生活方式,却又在共同的生态空间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关系网络,并在交流中达成共识。

《翠羽》还成功构建了一种“跨民族生态共同体”的叙事范式。在这一共同体中,不同民族共同构成一个生命交织、命运与共的有机整体。保护绿孔雀不仅是保护一个濒危物种,更是保护多民族共享的生态空间与文化记忆;彝族神话中的森林精灵、傣族传统中的孔雀舞,这些文化元素都与绿孔雀的保护产生了有机联系,展现出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体两面。作者李夏通过细腻的描写表明,生态危机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民族团结不仅是时代主题,更是生存智慧。这种将生态意识与民族关系相结合的视角,为理解中国多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文化资源,也为我们思考如何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者系云南省评协理事)